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一期 ——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2d)

【本刊专稿】	为蒙冤 22 年的丁盛将军翻案	舒 云
【国史论衡】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丁凯文
【文革一幕】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赵淮青
【人物春秋】	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文革”岁月 (上)	李意根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为蒙冤 22 年的丁盛将军翻案

• 舒 云 •

对丁盛将军印象深刻，还是在 1969 年 4 月，报刊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一正一副两个主席在前，丁盛将军排在其后。也就是说，除了毛、林，170 名中央委员，都按姓氏笔划排列，丁盛将军位列榜首。谁知 70 年代末，我却听说丁盛将军的遭遇，心中充满疑问。22 年中，丁盛将军一再泣血上诉，然而冤案如山。

—

1977 年 3 月 24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点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名，说他和“四人帮”是一伙。从此，曾躲过一场又一场政治灾难的丁盛将军被判了政治死刑。1977 年 3 月 26 日，丁盛将军被停职审查。11 月 5 日，被莫名关押，抄家，批斗，家人被赶出军区大院。

直到 1979 年 4 月，丁盛将军才解除关押。

1980年10月6日，两案审判前，丁盛将军再次被关押。11月12日，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宣布：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武装叛乱）。……

丁盛将军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因为除了马天水等三人的供词，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建议不要将丁盛列入起诉名单。1981年5月9日，丁盛将军被解除关押。

1982年6月19日，丁盛将军案经总政保卫部审查，移送军事检察院，提请免于起诉。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无视丁盛将军的辩解，仅凭马天水等三个案犯的口供，就主观认为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下达了丁盛将军的免于起诉书。说被告人丁盛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的规定，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24条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已经没有免于起诉。而在当时，免于起诉也是一种罪，不予起诉才是完全解脱罪犯状态，恢复公民身份。

现在看，两案审判中有13位高级干部被免于起诉，都是冤案！

免于起诉书说：丁盛对马、徐、王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60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丁盛还表示准备杀头。随后马天水等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放各种枪支弹药。因为这个谎言满篇的免于起诉书，丁盛将军被开除党籍，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每月生活费150元。南京军区提出在滁县、淮阴、扬州选择其一，丁盛对这三个地方都不同意。1984年7月，丁盛按一般干部交南昌市老干部局干休所，子女不能随迁。9月18日，丁盛将军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地，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失声痛哭。10月，南京军区同意丁盛将军回南京治疗，但只能住地方医院，丁盛将军住进铁路医院。为了申诉，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二

从此，丁盛将军的余生就在不断的伸冤中流逝。

1985年11月15日，丁盛将军在申诉书中详细叙述了与马天水等三人谈话的内容：

1975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剑英元帅指示，从9月至1976年2月，我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1976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8、9月南京军区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7月30日，我离开南京，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8月8日我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接我到上海，问我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21时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诉我：廖汉生政委张秘书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重视。陈秘书说丁司令员劳累要休息，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丁司令员打好。于是我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

话。不久，陈秘书说市委来电话，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来。

22时左右，他们来了，一见面，我寒暄这么晚了，还来看我。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海岛来，并讲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入侵者若想走日本鬼子的老路，肯定要失败。而长江口以北、以东我没有去过，但听说是水网地区，没有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我还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马天水一口答应，不成问题。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我问：你们很忙吧？马天水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7月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我说：是一致的。马天水问：60军政委魏金山怎么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说：他有病住院了。马天水说：上海警备区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他来的。马天水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马天水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上海警备区另一个政委刘耀宗不一样，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刘耀宗哪儿去了？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马天水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我表示感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廖汉生政委。

9月3日22时左右，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突然来延安饭店找我，我问他们来干什么？马天水说：最近有两批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市委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问我收到这封信没有？我说收到了，我们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陈锡联同志。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三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下发。其中说到“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这个事实有力证明了在马天水等人于丁盛谈话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决定给上海民兵发放武器，而马天水等人于丁盛的谈话在发完武器两个月后。免于起诉书为了给丁盛凑罪名，无视事实，硬把马天水等人给民兵发武器的时间推后两个月。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是错误的，8月1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突击发枪。而9月3日晚上丁盛将军与马天水等人谈话中才提到60军。为了给丁盛将军栽赃，硬把9月3日的谈话内容挪到8月8日晚上。

免于起诉决定书说丁盛与马天水等人“半夜密谈”。而实际上，丁盛与马天水等人从未深交，连一般寒暄也几乎没有，更何况丁盛对造反派嗤之以鼻。这就决定了8月8日的谈话只是礼节性的，怎么可能密谈？至于谈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说准备杀头的话，更是决不可能。

丁盛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诬陷！事实上8月8日晚上的谈话，马天水等人除问到60军政委魏金山哪去了，根本就没有提到60军。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

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60军没有任何关系。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从广州军区司令员调到南京军区任司令员。1976年2月17日，为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丁盛提出将60军调到沪宁线，经军区党委讨论，中央军委批准，1976年上半年，60军军部从南京调到镇江，所属180师从苏北调到无锡。这样，60军全部集中在沪宁线上。

丁盛将军说：如果我“最不放心60军”，为什么建议把60军调来？如果我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至于说我“准备杀头”，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么会说出此混账话？

丁盛将军说：8月8日与马天水等人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形势。9月3日晚上的谈话提到“打内战”，是因为许世友儿子许建信信中的内容，怎么成了我的话？毛主席的病情当时严格保密，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的只是演习，谈的也全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9月8日起施行。其中第52条：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1、被告人的身份；2、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3、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4、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5、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6、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7、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8、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1974年我调南京军区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3月，我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1975年1军和20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1976年8月8号晚和9月3日晚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9月6日我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回南京，我去上海市委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军队一无所知，军队调动不要说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就是军委副主席，也无权调动一兵一卒，军队调动大权掌握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哪怕调一个排的兵力也要毛泽东批准。所以，丁盛根本不可能说60军调不动这一类门外汉的话。如果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谈武装叛乱，为什么事前事后没有行动？搞武装叛乱不可能孤家寡人，为什么丁盛被揪出来，却没有一个人揭发？也没有一个人涉案？很明显，这是马、徐、王为减轻罪责，嫁祸于丁盛。丁盛认为：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两个晚上的简短谈话，而没有其他证据，就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这与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四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有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马天水等人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证人证

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是因为口供具有可塑性和易变性，审查口供证据是否确实，一方面要进行个别审查，即从证据的本身进行审查，如证人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鉴定结论所根据的资料是否可靠等；另一方面要对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分析它们彼此之间是否有矛盾。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遵循“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审理中，如果最后仍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以无罪论处。

换一个角度说，即使不能证明马天水等人伪造供词，按立法确定的“疑案从无”的原则，丁盛将军也应该完全无罪。

1985年，丁盛将军在申诉书中说：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决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为减轻其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我今年已72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丁盛将军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最后陈述。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一位处长倾听，但仍泥牛入海。

经丁盛将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说：上面有“精神”，“两案”已有结论的，一律不动，生活可以有所改善。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通知南京军区，将丁盛的生活费增加到200元，享受当地退休干部的生活和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待遇。1995年，经中央纪律委员会和军方协商，广州军区在司令部干休所为丁盛将军安排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

1998年8月，丁盛的老首长黄火青亲自出面为丁盛平反。

丁盛将军第N次申诉：今年我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中央军委主要领导批示：请军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答复仍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可是，生活改善也迟迟没有落实。

1999年8月26日，丁盛将军因高烧住进广州军区总医院，诊断肺炎。眼看丁盛将军病情日重，夫人孟文虹和子女给军委领导写信，请求为丁盛将军平反，没有回音。

1999年9月25日，丁盛将军含冤辞世。有关方面同意亲属办理丧事，却不能称将军、同志。10月7日，广州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丁盛将军告别会，700位来宾望着灵堂正中的黑色挽幛：丁盛老人……无不泪流满面。

~~~~~

【国史论衡】

#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 丁凯文 •

友人近日寄来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拜读之余，虽感此书比国内版的官修党史教材有了某些长足进步，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 一、“设国家主席”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

《难》书在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里称，“‘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激化，焦点在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第392页）首先，作者将林彪和江青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野心家集团”本身就是典型的官方式的思维，依然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案”审理时的定式将林彪与江青等人脸谱化；其次，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仅仅用“权力之争”来概括吗？这场斗争的实质何在？这个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真的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1970年8月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议程为：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讨论战备问题。由于会议上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党内斗争，人们往往着重关注了宪法修改的相关问题，并得出一个林彪和江青因为争权夺利而借用四届人大对“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结论。《难》书在此就认为“四届人大，被他们（指林彪与江青）认为是一个国家权力再分配的机会”。（第392页）

从1964年12月中共的第三届全国人大至此已六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再召开四届人大实乃顺理成章之事。以一般性惯例，召开人大之前有必要对现存的宪法作适当的修改，更何况上次人大是文革之前召开的，经历了这几年的文革风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需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合法化。这里有两点应该予以明确：其一，庐山会议的各项主要议题均不包含讨论政府机构主要人选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此之前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但是由于文革之中对毛泽东本人的狂热吹捧，在广大民众和党内高级干部之中依然认为国家主席一职非毛莫属，此点并无歧见。其二，政府机构主要成员方面的人选应在四届人大正式召开前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会议上议定。所以，概括而论，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并不是要确定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机构人选。既然这个所谓的前提本身并不存在，那种庐山会议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要为“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既有必然性，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偶然性。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程光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632—631页，又见《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5—448页）、余汝信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430期，2007年9月11日）都有详尽的评述，笔者深表赞同。笔者亦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400期，2007年4月3日）。概括而言，自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过渡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文革初期时的混乱局面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碰头会的阶段性功能已经消失，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未曾明言予以撤销，但是继续由它来领导中国政局的情势不

复存在。通过中共九大的召开，周恩来的执政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支持。然而，那些在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权力，除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进入了政治局，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宜，其他人等，如王力、关锋、戚本禹却成了“破坏文革运动”的反面人物锒铛入狱。由于缺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江青专属的“衙门”，江青等人的势力不仅未因中共九大的召开而壮大，反而还远远不如文革初期那般可以呼风唤雨、颐指气使。出于对这种政治局面的不满，江青等人不断以各种手段干扰中央工作，攻击周恩来与林彪，由于江青本人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周恩来与林彪基本上采取了忍让的态度，避免与之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林彪与江青等人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宪法修改中有关条文的讨论，张春桥自恃有江青在背后撑腰，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所本的，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9页）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内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林彪而来。随后吴法宪得到军委办事组以及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支持。面对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不断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种种挑衅、发难，林彪等人认为有必要对张春桥这些人予以批评、制约。所以说，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或迟或早都会到来，所不同的是它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而已。

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林彪在文革当中的一贯态度是“主席划圈我划圈”，平时对政治议题基本上不提前表态，一定要等到毛泽东点头同意才同意。为何庐山会议上林彪竟然一反常态，自己带头上阵批判起张春桥这位毛泽东文革运动的红人？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不发表那篇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就不会在全体中央委员之间掀起巨澜，也就不会有会议上发生中央委员们群起声讨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情况，从而引来江青、毛泽东的强烈反弹，以致后来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实事求是地看待庐山这场斗争，“设还是不设国家主席”原本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其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个常委均赞成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6—587页），康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甚至说“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7—392页）康生这番话就是明证。显然，庐山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内并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另一派反对“设国家主席”。党内虽然就“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某些分歧，但大家还都在拥毛的旗帜下大力维护毛的地位，期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然而，我们还需看到“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与庐山上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林彪出面批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不过就是一个口实而已。自文革以来，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以最革命自居，常常将别人打成“反党”、“反毛主席”或“反毛泽东思想”等，这次林彪在庐山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所谓张春桥“反毛”为借口打击张。看看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会议上的发言，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林彪发起的这场对文革极左派的

批评，迅速得到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广泛支持，几使张春桥面临灭顶之灾。庐山上林彪发起的这场斗争实乃中共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自“二月逆流”以来针对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反击，这才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所在，这个铁一般的史实是人们不应忽略和抹杀的。

## 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如何处理林案

有关毛泽东如何处理林彪一案的问题，《难》书重复官方多年的说辞，即周恩来向毛汇报：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第13页）笔者注意到《难》书里的一条材料“在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要汪东兴告诉周恩来，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起来。”《难》书还说“当十天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然而，作者却没有交代这条材料的来源，后面接着就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一事和毛的态度——其资料来源出自《周恩来年谱》下卷，惟周年谱并无毛要周将黄吴李邱控制起来的记载。

黄吴李邱四大将是林彪的嫡系，突然爆发的“九一三事件”的确震惊了中央最高层，毛要求周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控制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毛泽东是如何处理林案的呢？

首先，林彪突然乘机出走，飞机飞往蒙古方向，中方极可能面临与蒙古，特别是蒙古背后的苏联打交道的局面。在情况不甚明朗之时，中方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战备，防止外敌入侵。而相关的战备问题，必须依靠军委办事组现有的班子予以完成。请看：9月13日，周恩来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黄永胜还提出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南口方向的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9月14日，空军指挥所继续执行禁航的指令。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随后将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大军区，吴法宪还提出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执行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接下来的几天，军委办事组与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人通力配合，稳定全国局面，避免了发生任何其它的突发性事件。（《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867—878页）从9月13日到9月24日，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联系甚密，不仅随时听取汇报，而且直接指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吴法宪的回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求周恩来严密控制黄吴李邱四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更不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显而易见，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虽颇有“留用查看”的味道，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还必须暂时依靠他们度过这一危机时刻。《难》书作者认为，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控制黄吴李邱是为了保护军队将帅和中央领导人，宁可“纵容”黄等人销毁有关“罪证”，显然于史无据。黄永胜烧毁的那一点材料能与北戴河、毛家湾林办等住地被收缴的材料相比吗？汪东兴后来还不是将在毛家湾林家住宅收缴的一大批周恩来与林家合影以及江青与林家的合影等悄悄转给周恩来与江青予以销毁嘛。（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这是否也可解释为周恩来、江青与汪东兴合伙“毁灭证据”呢？

其次，对于林案的定性，1971年9月18日发出的中发（57）号文件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并未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不仅未牵连到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们，反而宣称：“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针对军委办事组和解放军内被认为是林彪一系人马的。为了与林彪“划清界限”，吴法宪在9月19日开始准备自己的检讨，9月21日，吴从凌晨起着手向中央写检讨直到凌晨四点。9月23日，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作了检讨，并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



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在24日凌晨四点送交中央，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74—878页）据笔者所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总参、海军和总后不仅抓紧落实战备工作，还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黄吴李邱都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林彪“划清界限”，以求得毛泽东的信任或宽容。现在官史上的所谓黄吴李邱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乃无稽之谈，那不过就是抓捕四大将的借口而已。

再次，1971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周恩来代表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一切职务，给你们找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妻子、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80页）周恩来的这一宣示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然而这一宣示仅仅告知黄吴李邱停职反省，且家属不受牵连，甚至郑重宣告“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无论是前期的叶剑英、杨成武时期，还是后来军委办事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他们与周恩来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不仅坚决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双方合作紧密，而且抵制江青等人对周的恶意攻击。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大力支持了军队老帅们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周恩来虽然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黄吴李邱的处理决定，在毛泽东指示前提下部署相关事宜，但是周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感情。周的这番话应不是廉价的矫揉造作（日后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周恩来的这份诺言并未真正兑现，不仅军队大批干部因此广受株连，黄吴李邱的家属也惨遭迫害）。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宣布的这一决定来看，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并未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作为林彪在军队中的嫡系骨干，随着林彪的倒台，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牵连。但是，如何处理此四人，毛泽东还是有自己的盘算的。此时的毛泽东尚不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放到卫戍区挂起来、养起来。这与文革期间被打倒并关进秦城监狱的很多老干部相比，黄吴李邱还是得到某种特别的待遇的。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说不定日后还有其他机会起用这些人，就如同后来让邓小平复出那样。

毛泽东为何如此处理黄吴李邱四大将？显然，“林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军队这些干部不处理是不行的，毛泽东对党内必须有个交代，否则不仅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不答应，其他人也会有看法——当时连与林彪关系密切，与黄吴李邱们站在一个阵营的汪东兴也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努力洗清自己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瓜葛。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5页）在这种情形下，让黄吴李邱离开关键的军队岗位，关到卫戍区停职反省亦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笔者曾于2005年与黄吴李邱子女们会晤，当面问及“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到底烧毁了什么东西。笔者被告知，烧毁的仅仅是一批黄家与林彪一家的照片，而所有党内、军内重要机密文件、往来信函等均保存完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毁灭证据”一事。

### 三、“林彪集团”辨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官方的大力宣传，似乎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现在事过境迁之后，党史学界即使不再强调、使用“反党”和“反革命”

这两个限定词，但是依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林彪野心家集团”，或简称曰“林彪集团”。笔者对《难》书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书至少65处在涉及林彪或林彪事件时使用“林彪集团”一词（至于《难》书中使用“江青集团”则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明显贬义的词汇是指林彪在文革期间成立了一个以林彪为首专干坏事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心怀叵测的，目的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就是以此作为审判的基调。我们有必要认真思索一下，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集团”吗？

在中共自己的词汇里，“集团”一词通常含有明显的贬义。举其荦荦大者，中共建国以来就有过“胡风反革命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等，更不用提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了。然而，正面人物是不会被称之为某某集团的，有谁听说过“毛泽东集团”或“周恩来集团”呢？由于中国党内、党外都没有一个民主机制，所以政治斗争总是呈现出不规则化、残酷化和扩大化，不仅将那些与领袖意见不一的干部打成某某集团，甚至他们的同事、部属甚至家属也都难以幸免于难。历史早已证明，这些被打成的各式各样“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无一例外都是冤案，当政者最终不得不平反当年制造的所有冤案。我们可否这样发问，既然中共建国以来这么多“集团”案都属冤案，难道“林彪集团”案会是一个例外吗？此外，“集团”一词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判定的标准何在？什么样的人应属于“集团”，是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仅凭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我们看到文革中经常发生这种现象，上级领导指称某人属于“某某集团”，该人则百口莫辩，从此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文革以来军队内部变化的大致情况。从文革伊始到“九一三事件”爆发，军队高层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三）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

第一个时期：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由于罗瑞卿与刘邓等人关系的密切，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首先在军内拔掉罗瑞卿，以扫清“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在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得利最大者莫过于叶剑英、杨成武，事后他们二人接手了罗在军内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参见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66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94期，2008年7月23日；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05期，2005年12月19日）由于林彪对军内的具体事务放手，这一期间由叶剑英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杨成武、萧华既为军委副秘书长，又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别又是代总长、总政主任，权责集中于叶、杨、萧三人。他们按照林彪稳定军队的要求，不使军队卷入地方式的文化夺权斗争，即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军队不得不介入地方文革事宜，军队本身也没有发生从下而上的夺权动乱，林彪的“军委八条命令”对军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林彪、叶剑英等人还尽力保护了一大批军队干部，并与文革极左派们周旋，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以军队老帅们的抗争失败而告终，叶剑英也被边缘化。如按《难》书作者的逻辑，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是否也应被划入所谓的“林彪集团”？

第二个时期：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由于叶剑英的离职，杨成武又时常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军内一时缺少了主政之人，军委看守小组应运而生，军委各总部领导分别各自办公，后在1967年10月间成立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有吴法宪、叶群、张秀川和邱会作。（参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见《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第45—48页；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载华夏文摘增刊59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23期，2007年8月13日）按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

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所以，军委办事组仅仅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其成员日后也稍有变化，直到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

第三个时期：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杨成武倒台后，由林彪提议，毛泽东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8年8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计有：大力加强战备工作、军队院校的调整、解放军总部和大军区的精简等。（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这期间与苏联之间还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事件和新疆铁列克提战斗等，军委办事组领导了抵御苏联的试探性进攻的工作。（参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12—350页）

这三个时期里，军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还曾分别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参与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特别是“三支两军”的工作，在文革前期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的工作，对稳定全国混乱的局面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当然在支左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面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人们深入探讨。但总的来说，军队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绝非加入了所谓的“林彪集团”从事篡党夺权的活动。

我们再看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关系：首先，他们之间是同事与上下级的关系，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他们都曾跟随毛泽东打天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共建国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文革时期成为负责军队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与其说他们属于林彪集团，还不如说他们同属毛泽东集团更为准确。其次，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实际上受到双重领导。军事方面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直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然而在政治方面，军委办事组更受到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直接领导。林彪对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并向军委办事组打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反过来周恩来也全力支持了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双方配合默契，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三支两军”和中共九大前后军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参见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313—348页）军委办事组在那个波诡云谲、变化多端的局面下，在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的领导下辛辛苦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目共睹。如果说他们在文革中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那也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要责任在毛，而不在他们自身。怎么可以仅凭一个“九一三事件”就将他们划入莫须有的“林彪集团”，让他们承担文革的罪责，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黄吴李邱四大将之所以被打入“林彪集团”，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都曾参与了林彪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的斗争，为毛泽东所不容。虽然庐山会议上批张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了压制林彪的影响力，逼迫林彪作检讨，毛泽东先在批陈整风会上指军委办事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随后又对军委办事组搞“掺沙子”等小动作。军委办事组参与了林彪对毛泽东钟爱的文革极左派的打击，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毛泽东必须在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逼出来了“九一三事件”。这才是林彪与军委办事组

倒台的真正原因。以现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眼光来看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他们当初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难道不应加以肯定和赞扬吗？如果承认叶剑英等老师们反对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是正义之举，为何林彪、黄吴李邱与这伙人的斗争就是“争权夺利”呢？这难道不是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吗？这与彭真等人在“两案”审判时所宣称的“好人犯错，坏人犯罪”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所以，将当年的那场党内斗争归结为“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争权夺利斗争只是简单地按照官方多年以来的说辞片面地解释这段历史，将黄吴李邱四大将打成“林彪死党”或曰“林彪集团”更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事件”，还黄吴李邱和众多军内受到无辜牵连的人们一个清白，而史家更需跳出“某某集团”这种典型的官史思维模式，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走笔至此，笔者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想加以论述，但是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面面面俱到。这里仅仅点出以备日后进一步思考、论述的一些问题。其一，《难》书的作者在批林彪和批江青方面不遗余力，但在批毛方面却着墨不多，与前者相比显得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作者还尽量区隔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关系，似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野心家集团”背着毛泽东干了大量罪恶勾当，这显然与史实相去太远，这恐怕也是《难》书的症结之所在；其二，周恩来与林彪的文革作用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难》书将文革中取得的成绩归结于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是周恩来抵制了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取得成绩，如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以及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然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成就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算作者不愿公开承认此点，也不应反过来指责林彪等人“瞎指挥”，更不应事事都是成绩归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而缺点、失误都归于林彪和江青“野心家集团”的捣乱破坏；其三，史家治史犹如法官断案，凭的是可靠的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非凭借想象、臆测或人云亦云。无论是当年中央专案组审查，还是后来的“两案”审理，都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发动了一场“杀毛政变”。然而《难》书依然认为“林彪集团则进入策划政变的秘密状态”，“林彪集团获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名批评林彪，认为四届人大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十分惊恐，决心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第186、393页）作者在这里笼统地指责“林彪集团”要发动政变，以作者的前后文逻辑，“林彪集团”当然包括了黄吴李邱四大将，那么请问，作者有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要发动武装政变？有何证据证实黄吴李邱也涉案？此外，笔者至今还强烈怀疑林立果是否真的策划过所谓的“杀毛大计”，现今官方所有的林立果涉嫌“杀毛政变”的指控都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迄今为止还未见到过任何林立果小圈子内的人公开承认过这类指控，相反倒是林立果身边的陈伦和公开否定了这一指控。（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531？文革博物馆通讯365期，2008年10月4日）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林立果所为，那么他们更想干掉的是张春桥，而非什么“杀毛”。以毛泽东文革中如日中天的神话般形象，有谁会愚蠢到去执行这个毫无成功希望的“杀毛大计”呢？笔者倾向认为，这条指控更像官方为了坐实林彪政变而凭空捏造的谎言，其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 原载《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

~~~~~

【文革一幕】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 赵淮青 •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 仇恨发芽便疯长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得风气之先,根据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月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篇社论见报后,许多干部群众乘车或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压力,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闻到了个中气味,把首都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以及哈尔滨军工大学一批天兵天将派到青海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这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雏形。嗣后各行各业陆续组织起“八一八”造反组织。于是,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

进入1967年,得到毛泽东支持,在上海首先兴起的夺权运动,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级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摇摇欲坠。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红卫兵闯进省委各部门串连,如入无人之境。《青海日报》红卫小组最先夺了报社的权,并发出号召全省夺权的社论,把夺权运动推向全省。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省军区刘邓反动路线”、“打倒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类的论调,埋下了军队与造反派冲突的隐患。

◇ 青海军区领导层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以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做出决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刘贤权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师长,后来升为军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起来后,刘贤权很快与之挂钩,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王昭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是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老部下,在青海人民心目中很有威望。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刘贤权的这一举动,军区内部大部分机关干部支持赵永夫,与刘贤权对抗。

有个背景应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江青当了顾问。并立即动手抄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家,这是部队上层机关乱起来的一个信号。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队高层领导的抵制,以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元帅为代表,坚决反对把部队搞乱,他们认为,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据说林彪也支持),经过多次与上边磋商,毛泽东认可了,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八条命令”,内容包括: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许武斗;不许抓人抄家;不许串连等。据权威人士分析,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希望把部队的“文革”进行到底,又担心军队失控,影响整个局势稳定的矛盾心理。“八条命令”的颁发,摆脱了军队领导机关的瘫痪状态。

“八条命令”下来后,青海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观点更加占了上风,刘贤权陷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军区附近张贴“打倒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革命军人要掉转枪

口，对准叛变革命的指挥员”等内容的大字报，军区大院门前，多次出现辩论场面。可是，由于广大官兵长期接受部队传统教育，老作风、老信念依然很有影响，对红卫兵的种种作为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 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

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联络青海其他驻军领导——205部队领导张晓川以及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的领导，组成了“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尽快接管《青海日报》，因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号召大乱，他们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报社领导班子必须改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先是，部队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2月3日，部队又出动250多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战士，在西宁街头进行武装游行，沿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以显示力量，威慑造反派。2月14日，部队公开宣布《青海日报》是非法的，必须实行军管，并派出十多个连队，占领了五个制高点，对报社印刷厂大院进行包围，一场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八一八”造反派针锋相对，从各行各业调来上千队员，日夜轮流守卫报社。他们带着红袖箍，把守通向报社的各个路口。入夜，报社印刷厂大院点起堆堆篝火，为人们驱寒照明。部队多次派代表与造反派领导交涉接管报社事宜，均遭到严词拒绝，有时甚至被驱逐出来。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组织示威游行，对部队表示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与对立面组织——“捍卫队”发生冲突。捍卫队一个女队员惨死在车轮之下。捍卫队当即抬着尸体游行，仇恨在斗争中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队联合指挥部公开宣布，“八一八”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下令立即取缔。

◇ 相持九天九夜，枪声大作

《青海日报》印刷厂大院坐落在湟水岸边，那些天成为两种势力对垒的焦点所在。“八一八”的头头们驻守在此，人称“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队领导赵永夫则坐镇西宁宾馆，亲自进行指挥，与报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在斗争最激烈时，刘贤权曾派人给“八一八”头头送信，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造反派的情绪日趋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在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漫骂声不堪入耳，这使部队官兵更加磨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赵永夫原来认为，“八一八”会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曾说“就是用刺刀挑，也要占领报社！”也说过：“如果‘八一八’开枪，我们坚决还击！”而实际“八一八”造反派却没有枪，而且对部队开枪，也缺少思想准备。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队包围报社的第九天，上午11时许，一阵清脆的枪声传来。刹那间，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戛然而声，部队的第一枪是对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发射的。这时，报社院子里混乱起来，人们小跑着出出进进。但是枪声很快停了。人们在等待。下午二时，枪声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声一样，从报社的前门响到后门。有冲锋枪声，也有机关枪声，连成一片。开始还能听到语录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就看见许多人扑倒在地，许多人向四处奔逃……

因为五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击，于是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赵永夫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移动，其中多数人受伤，行动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来。伤员们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悬空摇荡，仿佛仅仅连着一小点皮肉。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这支队伍最后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场上，有几个解放军班长、战士手持冲锋枪，飞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顶，铁青着脸，大声喊叫：“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而受伤的人们，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地上翻跟头，翻几下也就不动了。还有人嘶哑着嗓子喊叫：“快来给我包扎，疼死我啦！”而在战士眼里，这些人是洪水猛兽，是青面獠牙，谁会管他们呢！

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近200人，“俘虏”约2000人。就在响枪的那天晚上，有近万人被关进监牢，各机关、各单位开始残酷逼供，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位用烟头烧，铁丝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 来自北京的声音

开枪的当晚，赵永夫给中央军委一位元帅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对，总结经验。”直到“北京三司”红卫兵赶回首都，与“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头，江青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书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后来，“中央文革”做了调查，主要是听信返京红卫兵的一方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否认了他讲的“打得好”那些话。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是赵永夫夺了刘贤权的权；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待支持部队那一派，施行了同样残酷的批斗。仇恨一旦发芽，就要疯长。严刑拷打比比皆是，骇人刑罚时有所闻，虽未枪杀，也算是血腥报复吧！有一次，拥护赵永夫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近二百人，被带到掩埋被部队打死的工人、学生的墓地（有人称为“短期烈士陵园”），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在那次报复性的行动中，被打伤残者不在少数。

那一时期，同事之间，乃至家庭间、亲友间，为了“革”与“保”之争，能够发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报社一个美术编辑的妻子，“揭发”其夫要谋害伟大领袖，给那位美编带来了灾难。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八一八”得势时，一位领导曾拿一张放大照片给我看，说是从厕所墙壁上拍下的“反标”，上书“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并说据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说，“不像是他的字。”又问：“也许是左手写的呢？”我仍然说：“不像是他写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就能打成反革命吗？后来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当“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队打成反革命时，那个年轻记者也来找我，说他从兰州把那个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抓回来了，省军区领导与他意见一致，应该枪毙。我知道，当时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平常，于是建议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应该请示一下总社领导。”那位年轻记者与总社代社长王唯真通了电话，王问：“什么罪状？”接着又说：“你们先打个报告来，再定罪不迟。”后来那位领导被关进监狱，却没有被枪毙，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 省委书记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又明确点明，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被镇压，“同原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真是天大的冤

枉。此事与王昭并无关系，而王昭却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是晋察冀地区一个美名远扬的地委书记。与国民党作战时，参加过华北和西北的几大战役，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赏识。1961年春夏，与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一道，去甘肃、青海两省解决饥饿问题。此后即留在青海担任第二书记、省长，实际上负主要责任。他不畏艰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区作调查，并顶住重重阻力和极“左”势力，解决青海积重难返的问题，特别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和死人问题，恢复被破坏的草原，纠正平叛中一些过激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与违法乱纪做斗争，被老百姓誉为“王青天”。

“文革”开始，王昭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与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遇事往后缩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但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尽管他对“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组织大搞所谓破“四旧”，搞打、砸、抢、烧，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前后，他因胳膊摔坏，前往河南洛阳疗伤，没有参与“八一八”造反派与部队的矛盾冲突。中央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时，他被召唤到场，曾大声疾呼：“此事与我无关，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间，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刘贤权得到上层的信息和授意，在会上“揭发”，说王昭与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关系密切，是他们派到青海来的，应该拔掉这个钉子。《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审查，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当面叮嘱刘贤权和“八一八”负责人，“王昭不是黑帮，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你们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是当时的周恩来，说话已经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当即被栽赃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总后台”，一下子被推进仇恨的旋涡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属的残酷迫害。一个月时间，被批斗近五十次，每斗必打，每打必伤，胳膊多次被扭断，耳朵多次被撕坏，脸上被钉子扎了许多孔洞……后来又被送进南滩监狱。王昭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治疗上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不久又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关人还得到指示：“不能放虎归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仅53岁就惨死在狱中。1977年，胡耀邦出于无私正义的爱心，多次过问王昭的事，那年8月邓小平做了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领导全省公、检、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时遭到诬陷。就在那次为“开枪事件”定性的中央碰头会上，很少发言的林彪，听到在公安部为罗瑞卿任十年政治秘书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审查，竟说道：“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来！”几句话，把王仲方推进五年多铁窗生活，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他父亲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连被活活饿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

在批斗王昭、王仲方的同时，全省还有近百名厅局级干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被致残，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党”，“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错了队”。

赵永夫还算万幸，虽经多次残酷批斗，总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医院期间，受到部下保护，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无法下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变头子”的说辞，从监狱中放出来，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连治罪，这位精干刚强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卧轨自杀。

“文革”一全民族的互相摧残戕戮，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


~~~~~  
【人物春秋】

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文革”岁月（上）

• 李意根 •

黄克诚，1902年出生，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1965年，赋闲6年之久的黄克诚接到了赴山西省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的命令，在那里他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岁月……

◇ “抓走不过杀管关”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虽然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但是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让黄克诚最先感觉到“文革”气息的是在太原街上与杨尚昆的一次偶遇。1966年6月的一天，“流放”山西的黄克诚意外地在太原大街上见到杨尚昆。原来，杨尚昆因犯“错误”被下放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此时他是来向山西省委报到的。当时他俩几乎不敢相认，等彼此认出了对方，黄克诚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远离京城的地方，遇到朋友和故交，很是兴奋，拉起杨尚昆的手，真想好好说话。杨尚昆告诉黄克诚他住在太原饭店，在这里处理公务。黄克诚说抽空去看他，不料杨尚昆留下话：“你先忙，不要来看我……”黄克诚想，大概他也有了为难之处。杨、黄二人，过去同在三军团工作过，两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有一定的交情。如今杨尚昆的谨慎，使黄克诚陷入了困惑。直到几天后，山西省委送阅中央5月24日会议的通知时，黄克诚才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的消息，也才明白杨尚昆当时为什么那么谨慎了。

不久，黄克诚像以往一样，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考察，去检查农业工作。到了农民家里，黄克诚往炕上一蹴，就谈情况，同干部群众一起想办法。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此时满街都是大字报了。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无聊的时候就天天去外面看看大字报。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当年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在黄克诚看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却正对着红卫兵组织的“五大领袖”（即北大、清华、北航、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红卫兵的领袖）训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下十八层地狱啊？！”红卫兵们闻风而动，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回了北京。彭德怀回来了，自然少不了他的“军师”、“总参谋长”黄克诚了。

1967年1月的一天早饭后，黄克诚正准备出门去看大字报，突然听到有人打听黄克诚

住在哪里。问话声、杂乱的脚步声在房子周围响起，黄克诚这才预感到复劫来临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门就被撞开了，一共20多个带着杀气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眯着眼睛，终于把红卫兵怒气冲冲的脸看清楚。“要你黄克诚跟我们回北京！”红卫兵的话很坚决。

“为什么？”黄克诚想知道原因。“你自己难道还不明白吗？”红卫兵反问道。

黄克诚知道躲不过去了，就说通知下秘书，和省里交接下工作。造反派断然否决，并阻止他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吆！”黄克诚把电话摔掉在地下，故意闹出动静。他大声嚷道：“你们不讲道理不行。你们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讲理，是什么人？！”

红卫兵没料到这干瘦的老头有这么大嗓门，便一声压过一声地同他吵了起来。一时，惊动了大院里的许多人。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见目的达到了，黄克诚才罢休地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黄克诚被揪走时，神态从容镇静，有如当年驰骋沙场指挥作战一样沉稳，像平时去国防部大楼办公一样泰然。后来，他还为此赋诗一首：“抓走不过杀管关，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身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

第二天，红卫兵们就把黄克诚带到了北京。

从此，黄克诚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被带上一辆蒙有帆布的汽车。车在黑夜的街区转了几圈，最后在一所简易的营房里停下。他被年轻的士兵接管，关进了一间小屋。此时，黄克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经过同“中央文革”的斗争，从红卫兵的手中将黄克诚夺了回来，由傅崇碧安排卫戍区看管监护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警卫战士买来了生活用品。他自己的钱，战士开回发票。他突然从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的字样，他这才知道，他关在五棵松附近。

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月26日，在黄克诚押解到北京不久，他突然前列腺急性发炎。这是紧张、劳累和焦急以及不及时排尿的结果。夜里发作，第二天就疼痛难忍。哨兵逐级向上级报告，不久，来了一个军医张医生。张医生见到他，起初一怔。大概黄克诚经常深入基层，医生认出了他。医生没吭声，检查了病，看来治疗这类病他还不熟，先用一根导尿管导尿。过了几日，症状没有减轻，黄克诚便趴在铺上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写信，请求治疗。中央文革派解放军301医院医生前来核实。几天后，黄克诚被送到267医院，尽管住的是传染病人的房间，但他终于得到

了治疗。

住院期间，一位代表组织的领导来看望了他一次。黄克诚问为什么要抓他，那个领导不好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关照的结果，只是说这是在卫戍区，对他有保护作用。黄克诚当时不相信他说的，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被造反派斗得吃不消，自己主动要求“监护”时，才从心中充满对总理的深深敬意和感激。

3月底的一天，267医院侧平房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黄克诚听出来了，那是自己妻子唐棣华的脚步。两人见面，相对一笑。他们笑能在这里见面，笑过去谈过的话今天得到应验。原来，黄克诚离京之后，唐棣华下放到南方搞“四清”运动。工作结束时，她曾到山西与黄克诚见过一面。那次在山西虽然只呆了3天时间，但他们在一起谈了不少形势、命运和忧心。其中有句话两人还记得：“文革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的事情还没完，你也跑不了！”如今相见，实际上两人都没跑脱。

唐棣华细看了黄克诚的板床薄褥、房子也不挡风，还对外保密，不让人接触。她流下了凄苦的眼泪。黄克诚劝她不要难过，还向她打听孩子们的情况。正在唐棣华探望时，卫戍区的张医生来询问病情，见唐棣华在场，便向她介绍病情，说只是前列腺炎，不是癌症。唐棣华见医生还具有同情心，便感激不尽。探视时间到了，唐棣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间独立封闭的小屋……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便再没有回到卫戍区的军营。

#### ◇ “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从267医院出来以后，黄克诚的监护地点被转移到玉渊潭附近的八里庄一带。这是通过布置的监房，每人一间小屋，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卫是警卫森严的哨兵，每个关押者都有一个专案组。黄克诚住的是一个大约9平方米的小屋，一张板床、一张小桌、一个小凳，还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这就是黄克诚的狱中世界。

半个月后的一天，黄克诚被带到一座办公楼模样的地方。路上几百米，他被限定为低头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待带到目的地他才抬走头来，坐在他面前的专案组成员对他说：“黄克诚，从今天开始，你的反党集团案件就由我们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你要老实交待问题，把罪行说清楚。这样才是你的出路。”一本稿纸丢过来，先写自传，从小写到老。写不是什么难事，过去电报、文件都是他起草的。现在难在早期革命时期的事记不清了，有的人名地名也记不准了。但不管是否记得清楚，他得写。一个星期后，他把一份一万多字的自传交了上去。

材料刚交上去，专案组就要带人。起初黄克诚以为材料中的哪一个问题没有写清楚，到专案组交待问题去。不料一出门，就被带上汽车，约一个班的战士把他押解到一个会场。会场上口号声、歌声和嘶哑的嗓门叫唤此起彼伏。黄克诚的第一反应就是批斗，这是“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批斗，专案组的目的是为了“打态度”。这也是黄克诚等同案人苦旅的序幕。虽然在此之前彭德怀已遭受多次批斗，但批斗规模之大，会场之残酷和同案人的涉及之广，都是在这之后。经过20多次批斗，专案组认为被关押者的态度打击得差不多了，便开始了每个人的历史审查。

“中央成立专案组，专门审查过彭德怀、我和张闻天的问题，毛主席专门有指示的。”黄克诚提醒说。“正是查过才要查。原来查你们的贺龙，现在查出来是大军阀、大叛徒。现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查你们。你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审查就这样开始了。专案组首先从黄克诚的《自传》中找毛病，然后再让黄克诚一件件具体事写出来，进行全面交待。交待后就反复询问，哪个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不久，黄克诚摸出了规律。专案组问过以后，便专程到黄克诚的湖南老家进行调查。专案组也不辞劳苦，先后去了两趟。后来才知道，凡是被审查者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跑到了，并一一作了调查。这是一种特殊的调查，调查人员先设定被审查者有问题，然后按图索骥，收集证据，最后将被审查者定罪。

在专案组审查黄克诚的时候，他也在冷眼观察着“文化大革命”。为此，书生意气的黄克诚，曾写了两首词。一首是刚入狱时写的，名为《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堂，日习楷书百十字，细研经典两三章，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这首词恰如其分的反映了他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闲情逸致”还没过多久，在1967年5月至12月间，无聊中的黄克诚又填了一首名为《蝶恋花·桃花》的词，来表达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词中写道：“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 / 落地残红何足羨 / 且待来年看新瓣 / 人间变化千千万 /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 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外，专案又希望借这首词打倒黄克诚。在他们看来，这是黄克诚讥讽时事，是反对统帅一手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黄克诚没有“抵赖”，他如实交待：“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对‘文革’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交待当然无法令人满意，其结论他属于“顽固派”。

审查了大半年，大的问题没有发现。这一点是黄克诚自己判断的。还有一点，调查人员在询问经历时，没有就某一问题反复，一旦反复，问题就比较大。不过，这一次黄克诚的判断却有些失误。原来，专案组等大问题查完了，才来找他的茬儿。

那一天，专案组一个王姓的组长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黄克诚作了回答。几天后，又是这番提问，黄克诚又是这样回答。这一次审讯人员忍不住了，大声说：“你还是老实交待吧，把你制造假党员的经过说出来吧！”

原来，按照黄克诚交待，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第三师范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二人。刘寅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这次调查就是找的蒋元斋。外调人员说明来意，请他回忆是否介绍黄克诚入党，蒋元斋想了半天，摇了摇头。外调人员拿出黄克诚在三师上学的照片，蒋看了还是摇头。据此，专案组确定：黄克诚的党员是假的。

由于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组织给他指定的没见过面的人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所以他的介绍人蒋元斋忘记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黄克诚是假党员，岂不是荒唐？黄克诚也质问：有谁在大革命失败后冒充党员的？有谁冒充党员出生入死的？有谁冒充党员招致杀身之祸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专案组也不能回答。但他们宁“左”勿右，坚信黄克诚的“假党员”是真的，并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他承认。

先是车轮战，一连几个通宵达旦，审讯人员换班休息，而他们让黄克诚站着，一遍一遍背诵毛主席语录，一遍一遍交待入党的经过。不知说了多少遍，他们就是不满意，还要黄克诚继续说。第五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参加这次审讯。审读开始，两个人抓着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一会儿，他们让黄克诚“坐飞机”，把他的胳膊高高提起；一会儿，他们猛压他的手腕和关节，让黄克诚仰面朝天，双脚提起。黄克诚的身体在遭劫，心也在流血。

突然，他挣脱一只手，一把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地向自己头部砸去，直至砸得头上鲜血直流，继而休克。黄克诚不愿受辱，他使用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权力：以死抗争。

这一举动是专案组人员没有料到的。那个王姓组长连夜赶到现场，请医生包扎伤口，把黄克诚送到监房休息。

昏厥、劳累，黄克诚第二天晚上才醒来。几天水来不进遭受身心的摧残，使他难以动弹。尽管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神志清醒。他感到这样下去非被整死不可，所以他想给中央写信。写给谁呢？毛泽东忙。他决定写给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他慢慢地挣扎着起来，拿出了纸和笔，写道：“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

黄克诚写好信，轻轻地叫来哨兵，让哨兵把这封信转给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知道警卫是卫戍区的，军队的士兵服从纪律，他不会扣压给司令员的信。

第二天，专案组见黄克诚的伤势无大碍，便又重整旗鼓，再来围攻，整整逼迫24小时，仍无所获。这时专案组也累了，一个打手骂道：“你他妈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黄克诚大怒，忍不住也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反革命？”专案组人员一听，来了劲，说道：“好啊！你还敢骂人，现行反革命！”这一下，几十个人围了上来。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付你们。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的专案组成员觉得被黄克诚戏弄了，正准备上来大动干戈时，姓王的组长来了，一番问寒问暖。又给打手们一阵耳语。过了一会儿，一个打手问道：“为什么给林副主席写信啊？写信要经过我们，知道吗？”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黄克诚知道林彪已收到信，便说，“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呢？”这一天就这样草草收场。

后来，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1968年8月，因名义上主管彭德怀和黄克诚案件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主持工作的杨成武由于“杨、余、傅事件”出了问题，黄克诚案件就交由黄永胜、吴法宪主管，关押地点也被重新转移到公主坟一带。在这里，仍是一人一个监号，相互之间不能走动联络。在八里庄时，冬天还可以生炉子，黄克诚尽管不会生煤炉，常把满屋弄得烟雾弥漫，但毕竟还可以弄点火加温。这里虽然屋里有暖气，但被关掉了。冬天来临，外面滴水成冰，室内如同冰窖，日子就更难过了。手臂因冻得疼痛难忍，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

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大约在黄克诚转移监号不久，在惟一同他联系的老伴唐棣华被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干校去了。她临走时，捎来一包衣服和食物，并附信告知孩子们有的在农场，有的下了乡，以后再不能给他送东西了。而就是这封至为重要的信，居然被专案组给扣压了。从此，黄克诚完全同家人断绝了联系。

由于吴法宪等人的精力集中在彭德怀等人的身上，加上可能林彪就黄克诚给他写的那封信做过不要太过为难他的指示，反正在公主坟的监狱里，黄克诚受到的批斗和审查就没有前期那么激烈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一时期，黄克诚抓紧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撰写了10余万字的自传材料。他在晚年时颇为自得地说：“若不是被关押了8年之久，哪里会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写自传？”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